

中国主要社会思潮
丛书主编——郭忠华

NEO

LIBE

RA

LISM

李泉
——
主编

新自由主义
研究与批判

思想的博物馆，时代的风向标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主要社会思潮

丛书主编——郭忠华

NEO

李泉
——
主编

LIBE

新自由主义
研究与批判

RA

LISM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自由主义研究与批判/李泉主编.—上海:格

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5

(中国主要社会思潮)

ISBN 978-7-5432-2980-8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中国

IV. ①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0326 号

责任编辑 裴乾坤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中国主要社会思潮

新自由主义研究与批判

李 泉 主编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

插 页 3

字 数 139,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980-8/D·120

定 价 52.00 元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评研究”
(项目编号: 16ZDA100) 的阶段性成果

目 录

导言：新自由主义与转型中国 __ 1

上篇 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中国转型及其批判

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 __ 11

企业家将决定中国增长潜力 张维迎 __ 54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研究 林毅夫 __ 67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大卫·哈维 __ 86

下篇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趋势与批判反思

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姚中秋 __ 123

新启蒙：衰败与修正 李北方 __ 146

治理理论与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的兴起 李 泉 __ 154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危害 朱安东 王天翼 __ 189

导 言： 新自由主义与转型中国

过去 40 年中，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和知识版图。这种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序幕出现在英美保守主义政府时期的战略性政府重组，随即一股流行全球的政治改革浪潮传播到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的核心部分，公共部门变革中涉及的规范原则与操作技术在流行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管理主义和治理理论等文献中得到详尽的阐述。这些理论为论证新自由主义者进行的政策变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知识系统。

在当代针对新自由主义的众多研究者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其代表作《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追溯了不同类型国家经历新自由主义转型的轨迹，并且全面而系统地勾勒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格局。这样的历史和比较研究使得哈维得以将新自由主义界定为一项政治规划(political project)，具体包括实践战略和理论设计这两个相互影响的方面。其中前者指的是一系列为资本的有效积累和阶级权力的形成或重塑创造条件的行动策略。后者则指向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理论，主张通过在私人产权、自我管制的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制度

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业自由,进而最大程度上推进人类的福祉。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哈维进一步洞察到,这些观念尽管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却是政治变革中真实而强大的力量。^①由此哈维概括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

(1) 新自由主义规划的主要目标是重塑资本积累,进而恢复资本主义精英的阶级力量;

(2) 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是这些精英使用的核心战略;

(3) 国家对新自由主义规划的推行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创造和维系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国家自身也采取了企业化的治理模式;

(4) 以个体自由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话语在指导、掩饰和辩护实践议程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5) 新自由主义实践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地域发展不平衡;

(6) 新自由主义规划在实现乌托邦目标方面的失败和在重塑阶级权力方面的成功,催生了具有平等、正义和民主诉求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7) 为了维持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统治阶级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国家的威权性权力。^②

根据哈维的概括,这七项特征凸显了新自由主义体制是一个具有单一目标和多种手段的比较连贯的政治议程。细致分析这些特

① [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章。

② Harvey, D., "Neoliberalism as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10, No.1(2007), pp.21—44.

征,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在新自由主义试验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事实上,国家一旦实施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便会积极参与到新自由主义所有七个方面的运行中。哈维形象地将这种类型的国家称为新自由主义国家(the neoliberal state)。相比于古典自由主义将国家消极地视为“守夜人”角色,这种新的国家类型的出现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独特特征。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国家的首要职责已经转变为促进商业利益,而非普通民众的福利。因为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社会发展的唯一引擎应该是贡献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企业家阶层。普通民众通过所谓的“滴漏效应”只是分享了企业创造的利益。为此,国家不仅要容忍少数富人与大多数普通人之间存在的社会差距,甚至还需要为拉大这种差距创造有利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富有创新精神和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们提供足够的激励。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国家不应该“越位”。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因为国家无法获取包括市场价格在内的充分信息,而且大多数人的民主利益也必然扭曲国家的市场干预措施。

通过有机结合这些积极和消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者在论证国家的目的和功能方面得以建立比前辈更为强大的规范性立场。但在实践中,与这项规划相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并不奏效,却成功地重塑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力。^①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成就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对财富的再分配。与规范论述中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角色颇为不同的是,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及其公共政策则是将财富和收入从人口的下层转移到了上层阶级。这些由国家发动和推行的私有化项目和削减社会支出的努

^① Ostry, J., Loungani, P. and Furceri, D., “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53, No.2(2016), pp.38—41.

力,被哈维称为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由此可见,国家才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引擎。

一旦明确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组成要素,转型中国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就变得明朗了。其中的关键是,如何衡量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以及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理想类型不同。这里强调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是重要的,因为即使哈维自己在考察中国个案时,似乎也混淆了实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区别。他将中国看作一个奇怪的案例,因为其转型的结果是一种在中央集权的威权统治下的新自由主义形态。^①威权主义国家的存在事实表明中国已经偏离了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那么如何解决以现行国家体制为焦点存在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张力呢?

对那些确信中国符合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学者来说,这种张力可以通过辩证地解释两者的关系得到解决。例如,汪晖追溯了改革初期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渊源,他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形成了支配性的治理格局,这是转型国家为了克服经济改革带来的合法性危机而催生的政策结果。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领域构建的反政府话语是这种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非政治话语”(apolitical discourse)有效地掩盖了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其实是来自国家干预的结果。而且,该话语创造了一个过渡的神话,即各种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的商业精英与国家官僚干部的密切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在汪晖看来,转型国家在意识形态中无形的主导作用,恰恰是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既成统治地位的标志。^②

① Harvey, D.,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② 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年第6期,第1—65页。

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恰恰揭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吴缚龙在随后的结构分析中证实,新自由主义确实可以描述中国市场化转型的一些基本特征。他表明,这种威权主义控制并不是以前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而是对市场化积累造成的社会问题的有意识回应。在改革时期,市场已经成为主导机制,而市场本身则由国家主导。最为重要的是,除了转型国家之外,事实上没有其他主体能够成为市场化进程的创造者、维系者和捍卫者。^①

当然学界对这种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描述也存在一些质疑。例如,王爱华(Aihwa Ong)就直接挑战了哈维的观点。她指出:“由于存在对新自由主义规范模型的依赖,哈维在将中国归类入新自由主义的模板时遇到了麻烦。中国的异质性在于其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与威权主义国家相结合的。哈维采用的新自由主义模型的重点是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这样会显得不够灵活,难以将在民族国家范围相互之间具有复杂影响的各种制度、项目和行动主体纳入考量。”^②为此,王爱华建议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流动的治理技术(mobile technology of governance)。强大的国家控制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一个部分。与此类似,唐纳德·诺尼尼(Donald Nonini)也批评了哈维的说法,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是新自由主义,是由于经济实践与政治意识形态产生的明显分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发展出一种结合了早期的社会主义、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战略的混合经济模式。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话语也表现出坚持社会主义的承诺,而这在典型新自由主义者眼中是很奇怪的。更重

① Wu, F.,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Neoliberalization as Establishing a Market Society”, *Geoforum*, Vol.39, No.3(2008), pp.1093—1096.

② Ong, A., “Neoliberalism as a Mobile Techn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32, No.1(2007), p.4.

要的是,诺尼尼不仅注意到了在同时期出现的新兴官僚资产阶级,还明确说明了存在于新阶级中的特殊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加速了少数精英对社会大多数的剥夺,同时为资本加速积累创造了条件。^①鉴于哈维自己也曾强调国家在再分配政策中的核心作用(见上文),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位学者对微观治理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强调与哈维的基本立场并不冲突,反而可以看作对哈维针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现象分析的必要补充。

如果我们注意到上述在转型中国的案例中出现的分歧立场,便可以发现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和动态性分析之间的张力。这背后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与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区别,而这两个哲学流派在如何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权力结构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争论。这里我们选择暂时搁置这个艰深且关系不甚紧密的议题,而是将焦点集中在观察转型中国与新自由主义关系这一特定问题上。遵循哈维的见解,我们需要从意识形态和实践策略两方面来加以考量。此外,正如王爱华提醒的,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在新自由主义实践进程中这两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如果这个基本立场是有效的,我们立即就会看到,用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标准来考察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偏差现象时所犯的错误。这是哈维连同其批评者共同的错误。此外,他们也忽视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其辩护的实践策略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汪晖正确指出的,中国知识领域盛行的反国家话语并不损害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统治地位,相反却成了后者有力的辩护。

因此,用强大的国家控制的事实作为支持中国例外论的做法,

^① Nonini, D., "Is China Becoming Neoliberal?"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28, No.2(2008), pp.145—176.

既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反国家话语的意识形态特质,也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将其从实践引向了意识形态领域。在这一问题上或许更好的解决方法是将焦点牢牢锁定在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可能是结构视角和动态视角研究者们的共识,即在实践领域由官员控制的一个强大的和企业式的国家的存在,可能正是转型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模板之间的背离呢?在这方面哈维没有提供任何有帮助的见解,这一部分在他针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中也是缺失的。然而,即便是哈维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界定可以成为一个有益的参照点。简言之,对哈维等人来说,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它是一套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产生是有意为之,并非偶然。正如哈维所解释的那样,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需要阐明那些在常识中根深蒂固、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概念。此外,一套观念体系只有自然地吸引我们的直觉和本能、我们的价值观和诉求,以及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性时,才能成功建立起来。^①基于这些观察,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物往往把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诺尼尼在接受这种描述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整性的怀疑,因为它对自由的关注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明显。然而,他的研究也停留在了这里,没有进一步考虑除了典型的自由话语之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进程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意识形态结构来论证。这导致他的分析仍然是不

① Harvey, D., "Neoliberalism as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10, No.1(2007).

完整的。正如采用结构视角和动态视角的研究者在理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方面所犯下的错误一样,对中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缺乏深入的认识,反映出了他们在解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多样性时的盲点。对目前的学术界来说,究竟是什么激励了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从一个规范的立场出发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利益计算来行动,仍然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领域。

以上关于中国新自由主义研究现状的简短讨论及其反映出的问题是我们编撰这部研究文集的主要原因。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的阶段成果,我们致力于为学界同仁攻克这一难题贡献坚实的文本和思想基础。为了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勾勒出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图景,我们精心挑选了对这一问题持不同学术立场和倾向的代表学者,收录了他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撰写的八篇重要作品,以两个彼此相关且各有侧重的主题分别呈献给读者。

在本书的资料收集和编辑过程中,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陈宇、梁诗琪、林映吟、潘逸舟和孙昊宇五位同学付出了许多辛劳。没有他们积极和高效的工作,本书不可能如期问世。最后,囿于编者自身学识和能力的限制,本书的内容难免存在诸多不足。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借此努力,在中国政治学界激发更加丰富的讨论和严肃的反思,为深入剖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提供思想的动力与方向。

李 泉

2018年6月20日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上 篇

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
中国转型及其批判

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

一、中国的问题

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80年。1979年的秋天,我告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北京与将来的史学家无疑会选1978年为改革的起点。这个日期明确为1978年12月18日。那天,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有了这个日子,罗纳德·科斯策划的这个中国研讨会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

当年的三中全会决定了两件事:(1)中国开放推动经济发展;

* 张五常,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1969年张五常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源自张五常于2008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由科斯自费筹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2008 Chicago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上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稿。此处为其本人亲自翻译的中文版,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2008年以中英双语在香港花千树出版社出版,2009年在北京中信出版社再版,此处略有删改。该文被引次数多达232次,引起学界极大反响。

(2)邓小平再获授权。那时,相信这两项公布的人不多吧。关于经济,类似的豪言壮语曾经有人表达过。至于邓小平的复出,这是第三次了。虽然这一次说明他获得授予的是最高的权力,但资历比他高而又反对市场经济的同志,大有人在,而1978年的中国,资历辈分很重要。有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邓小平可能再下台。

1979年的夏天,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要求我写关于中国的前景。他说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对一个学术性的分析有兴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越来越有兴趣地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1981年,我察觉到中国的局势在急速转变,于是为该学社写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册子的文章。1982年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①作出了肯定的推断:是的,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延迟了一年才出版,因为不同意的批评者无数。在西雅图最亲密的同事巴泽尔不同意我的推断,但他认为关于理论那一节真好,不发表很可惜。

于今回顾,我当年的准确推断使朋友与同事惊奇,而我自己惊奇的是改革的发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生于一个那么庞大、人口那么多而又是那么复杂的中国,近于不可置信。还有,在这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完善的司法制度,面对教育与医疗问题,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

大约2003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

^①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